

聂荣臻的潜伏往事

香港“潜伏”中的爱情

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，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。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改变了他的性格。

“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，你爸爸在老家、在法国时，是很活跃开朗的，爱说爱笑，后来怎么就变了呢？我知道，这与他地下斗争时形成的保密观念有很大关系。后来的他，惜言如金，不爱讲话，慎之又慎。”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说。

在香港，聂荣臻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，然而一位秀丽聪颖的女性却让聂荣臻的生活充满了温馨。她就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共产党员张瑞华。聂荣臻初次对张瑞华表达爱慕之情时，张瑞华害羞得不知如何是好。“那两天，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‘那个人’的影子：他好像挺严肃，挺严厉……但是，又从未见过他发脾气……他个子挺拔，相貌坚毅，还特别爱整洁……那严厉一点又怎么样？嗨！不怕他！……母亲轻松地

笑了，从心里同意了。”

1928年4月，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。这年聂荣臻29岁，张瑞华19岁。组织上规定，搞地下工作的同志，男的每月15元，女的每月7元，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。这点收入在香港并不算多，还要不停地外出，生活自然是非常困难。

“母亲告诉我，整个夏天，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。”有一次，张瑞华提出让丈夫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，聂荣臻以为妻子想买衣服了，就陪她去了。到了柜台，张瑞华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，逼着他试穿。聂荣臻明白了妻子的意思，又拗不过，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，眼珠转了转，便凑到妻子耳边说：“有情况。”他拉着妻子匆匆离开店铺。“等母亲明白这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，只能苦笑。”

三次虎口脱险

“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。”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父亲三

次遇险的情形。

第一次是结婚前，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、叶剑英碰完头，回自己的住处，刚到门口，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，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。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：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？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。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，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。聂荣臻知道出事了，从容地离开了。

事后得知，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，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，便立即扑过来了。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，聂荣臻刚到香港，为了便于联系，就把自己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书记沈宝同。恰巧那会儿父亲不在，躲过一劫。

第二次，是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，聂荣臻也要参会。他去的途中，因事耽搁了一小会儿，等他赶去时，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。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，怎么往下走？父亲立即意识到，他们被敌人控制了。他镇静了一下，表情轻松，大摇大摆

地继续往楼上走，和敌人擦肩而过，敌人反倒没怀疑他。

第三次，聂荣臻遇到了叛徒。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，外出经常坐电车，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。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，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，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。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，还冲他点点头。聂荣臻知道不妙，如果他上前动手就麻烦了，就瞅准时机，挤到门口，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。“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，做秘密工作的人，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。”

地下斗争中，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，香港的警察穿皮靴，走起路来“咔咔”响，很有节奏，老远就能听到，他外出执行任务，尤其是在夜里，一听到这种声音，就及时避开。

“父亲总结道，马虎大意的人，不适合白区工作。有不少好同志，就是因为粗心大意，白白牺牲了自己。悲剧的发生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。”（据中新网）

■ 郑佳文

法国地方法官在2013年10月撤销了对萨科齐的指控。

谁拥有后欧莱雅时代？

利利亚娜在老年痴呆症的阴霾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，被她的狗和仆人包围着，住在位于塞纳河畔的豪宅中。在女儿的严密控制下，她再也见不到她最亲密的朋友。大多数时间里，她认不出弗朗索瓦丝，两个孙子对她来说更像陌生人。至于巴尼耶，她甚至认不出他的名字。

2017年9月20日，弗朗索瓦丝宣布了母亲去世的消息，称“母亲走得很安详”。但因为“贝当古事件”，利利亚娜生命中最后十年很可能与“安详”绝缘：“每天早上打开电视机，我能看到的就是可恶的指责。”有报道说，弗朗索瓦丝总说她是为了保护利利亚娜，但她的行为带给利利亚娜的痛苦显然多过安慰。

根据法国的继承法，作为利利亚娜唯一的子女，弗朗索瓦丝至少可以继承利利亚娜50%的财产。但彭博社分析认为，她将继承母亲所有的财产，从她母亲手中接过“世界女首富”的名号。《贝当古事件》一书作者汤姆·桑科顿说，从任何一方面说，弗朗索瓦丝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（据《看世界》）

秘密大转移：中共中央离沪始末

■ 王春华

上海是解放前国民党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城市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发源地。中共“一大”“二大”和“四大”会议都曾在此召开。并且在近12年的时间里，除了几次短暂伪迁寓，早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，领导并指挥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。1933年1月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，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

猝不及防的“叛变投敌”

顾顺章是生于上海、长于上海的本地人。1926年9月，顾顺章被中共委派去苏联培训学习武装暴动经验。在莫斯科学习一年后回国，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

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，也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和经济中心。在上海设立共产党机关，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与影响力。然而，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，上海一时间变成了白色恐怖的地方，为了保护中共领导人的人身安全，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活动，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了“中央特科”，顾顺章就是“中央特科”的主要负责人，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。

周恩来命悬一线

尽管周恩来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，顾顺章的叛变仍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党领导集体的力量。

1931年6月22日，时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。向忠发曾是中共高级领导人，却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。他叛变投向国民党后，向蒋介石提出了许多要求，最后因丧失了利用价值而被国民党枪决。连续的叛变，给上海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也给地下党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，尤其是周恩来。

周恩来是“中央特科”的创始人和总指挥，也是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周恩来与顾顺章和向忠发之间接触频繁，两人对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规律了如指掌。

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党中

虽然顾顺章有一定的才能，但因为从小生活在上海，他的骨子里有着强烈的享乐主义思想，参加革命也多少带有一些功利心。1931年4月，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

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，顾顺章和陈昌浩等人在汉口下船休息，按照党内纪律，顾顺章等人在护送期间不得公开参与任何与工作无关的活动。可是，顾顺章不顾劝阻，前往“新世界”看戏，并以“化广奇”为化名，公开上台表演魔术，结果被特务发现被捕，不久即叛变投敌。

顾顺章是“中央特科”的主要负责人，他深知党对叛徒的处

置严厉。为了保住性命，顾顺章提出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。国民党武汉特务连续向南京发了多份加急电报，请示蒋介石。所幸，这些加急电报被我地下党钱壮飞截获。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，十分震惊，为了减少顾顺章叛变对我党的损失，周恩来亲自安排中共上海地下人员迅速撤离上海。

就在顾顺章被秘密押送到南京并面见蒋介石的同时，周恩来领导并采取了系列紧急果断的措施。一批批中共领导，一边销毁机密文件，一边紧急转移。凡是顾顺章认识的人，凡是顾顺章熟悉的接头暗号，必须马上撤离，更换。

自从周恩来撤离上海以后，上海的临时中央越来越难以立足。1933年初，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陆续撤离上海。经过精心安排，博古、张闻天、陈云等人，在“中央特科”红队和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，历尽艰辛，冲破层层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线，终于到达江西瑞金。

在上海临时中央撤离上海之前，博古按照王明的意愿，另行组织成立了“上海中央局”。“上海中央局”主要成员有卢福坦、李竹声、盛忠亮等人。可是，自从上海党中央成员陆续撤离上海后，“上海中央局”因为缺少正确的领导路线，在成立后的两年时间内连续6次遭到敌人的破坏，卢福坦、李竹声、盛忠亮三人先后被捕叛变，导致整个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，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。

1935年8月26日，中共著名特工王世英接到王明的两封信，这两封信是王明从莫斯科费尽周折转到王世英手上的。王明在信中指示王世英结束“上海中央局”的工作。遵照王明的指示，王世英负责把“上海中央局”的其他同志安全地转移到了天津。

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，终于安全地到达福建省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，然后在苏区6名武装人员的护送下，于12月下旬抵达苏区瑞金，担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。



云南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



青海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



成都北路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

“上海中央局”大转移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周恩来撤离上海期间，王明也在为撤离上海做着精心准备。经过慎重考虑，王明决定前往莫斯科寻求保护。王明在离开上海前，特意指定博古、张闻天、卢福坦、李竹生、赵容、陈云等人组成临时政治局，博古、张闻天、卢福坦三人担任政治局常委。在这些新组织的领导人中，博古年纪最轻，对王明言听计从。因此，王明特别重用并提拔了博古。目的就是让自己人在莫斯科，还能掌控中共权力。临行前，王明反复交代博古：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打电报请示报告，没有自己的批示，任何事情都不可执行。

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段最复杂性时期，也是中共党史上最为阴暗的一段岁月。王明在莫斯科吃着洋面包，过着舒服的生活，年仅24岁的博古按照王明的意愿发号施令。由于王明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瞎指挥、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。

自从周恩来撤离上海以后，上海的临时中央越来越难以立足。1933年初，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陆续撤离上海。经过精心安排，博古、张闻天、陈云等人，在“中央特科”红队和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，历尽艰辛，冲破层层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线，终于到达江西瑞金。

在上海临时中央撤离上海之前，博古按照王明的意愿，另行组织成立了“上海中央局”。“上海中央局”主要成员有卢福坦、李竹声、盛忠亮等人。可是，自从上海党中央成员陆续撤离上海后，“上海中央局”因为缺少正确的领导路线，在成立后的两年时间内连续6次遭到敌人的破坏，卢福坦、李竹声、盛忠亮三人先后被捕叛变，导致整个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，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。

1935年8月26日，中共著名特工王世英接到王明的两封信，这两封信是王明从莫斯科费尽周折转到王世英手上的。王明在信中指示王世英结束“上海中央局”的工作。遵照王明的指示，王世英负责把“上海中央局”的其他同志安全地转移到了天津。

（据《党史纵横》）